

谁的泰戈尔?

——读《泰戈尔与中国》

留白 | Liu Bai

20世纪后半叶,像泰戈尔那样受到中国官方礼遇的外国作家大概很少,他几乎是作为和平使者而被主流意识形态大力宣传的,宣传的效果自然很显著,即使一个并不喜欢文学的人也不会对泰戈尔一无所知就是证明。我的孩提时代,似乎到处都可见到泰戈尔的照片、介绍和文学作品。忘记是哪本杂志的封面了,那位坐在藤椅上,一派仙风道骨的印度诗翁一下子就征服了一个好奇的中国儿童。古语有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我从戴着眼镜、面容慈祥、有着一蓬漂亮大胡子的泰戈尔身上,却能感受到某种超越民族和文化的亲和力。后来读书买书,泰戈尔的诗文集自然首当其冲。

所以,当我拿到孙宜学的新著《泰戈尔与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时,心情是有些微妙的。我希望了解的不是作者眼里的泰戈尔,也不是追捧者如徐志摩、批评者如陈独秀眼里的泰戈尔,而是一个在特定历史场景中出现的,能够修正我以前模糊印象的真实、立体、瑕瑜互见的泰戈尔。一口气读完这本并不厚的书,我要说,上述预期基本得到了满足,掩卷之后,犹如观了一场好剧,留下了悠长的回味。

用事实和材料说话是本书最大的特色。作者几乎是在用编年史的写法运用他掌握的文献,大到一次论争,小到一封信,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话语等等,无不言之有据,信而有征。特别是书后的两个附录,即《中国翻译的泰戈尔作品目录(1900—1949)》以及《中国关于泰戈尔的介绍、研究论文、著作目录(1900—1949)》,没有几年的文献爬梳和钩沉索隐功夫是无法完成的。

这本书给人留下了不少思考的余地。它以泰戈尔访华这一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典型事件作为切入点,为读者剖开了已经凝固为整体的历史躯干上一个具有特殊价值的横截面,让我们看到了1920年代初期中国知识界的基本生态和各色人等。尽管历史无法真正被还原,但我们还是透过那些曾经鲜活的文字,看到了某些真实的图像,听到了某些嘈杂的声音。泰戈尔这位世

界级的文学巨匠,犹如一块燃烧的石头投进了旧中国这潭近乎“绝望的死水”,激起了让他以及历史本身都始料不及的“微澜”和“嘶鸣”。于是,读者仿佛置身于热闹的剧场,泰戈尔无疑是主演,但透过历史的潜望镜,环绕着他的观众也成了我们眼里的演员。在书中出场的皆是一时之选,且都有精彩表现:崇拜者如徐志摩、梁启超等人把泰戈尔当作“活神仙”、“救世主”,批判者如陈独秀、吴稚晖等公然叫骂“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甚至要把泰氏的“尊口”封起来。也有冷眼旁观者如鲁迅,戏演得热闹时他绝不入场,曲终人散了,他却让你领略到“冰火九重天”的况味。不仅《骂杀与捧杀》一文将泰戈尔当作被“捧杀”的好例,在《论照相之类》里也不忘施以冷嘲。

也许,在这场涉及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博弈和交流中,只有胡适的态度还算有君子之风。针对有人在泰戈尔的演讲中散发反对传单的行为,胡适批评说:“我们一面要争自由,一面却不许别人有言论的自由,这是什么道理?假使我因为不赞成你的主张,也就‘激颜厉色要送你走’,你是不是要说我野蛮?主张尽管不同,辩论尽管激烈,但若因为主张不同而生出不容忍的态度或竟取不容忍的手段,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自己取消鼓吹自由的资格。自由的真基础是对于对方的主张的容忍与敬意。”胡适这位自由主义者对泰戈尔的态度“很矛盾”,他自己公开承认“吾尝亦为反对泰戈尔来华之一人,然自泰戈尔来华之后,则又绝对敬仰之,盖吾以为中国乃一君子之国,吾人应为有礼之人”云云。说实话,在“热”和“冷”之间,我倒是更欣赏胡适的这种“矛盾”。——面对文化之问题,真正不矛盾,言必称“革命”或自以为“真理”在握的人,我总以为不可靠。

也许是出于对这位诗人的崇敬吧,作者没有将分析的笔触指向泰戈尔。而我以为,80年前那次访华留下的遗憾,泰氏本人也难辞其咎。有句不雅的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屁股下面当然是板凳,是交椅,是位子。



一个世俗中人,很难保证不被屁股底下的东西冲昏了头脑,丧失了判断力。我们固然不能苛求泰戈尔像敢于拒领诺贝尔奖,并声称“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的萨特那样,对世俗的欢呼也能岿然不动。但从他自谓如果此行“只做什么无聊的诗歌,我如何对得起中国盼望我的朋友”可知,徐志摩等人的追捧的确让老诗人头脑发热了,以至于不假思索就接受了欢迎者给他设计的神坛和圣袍。鲁迅曾指出过,“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糊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可以说,泰戈尔下船伊始,便开始扮演一个别人希望的角色,嘴里难免要说出一些符合角色的话来,而由此带来的结果却是他那原本高洁的灵魂不能承受的。泰戈尔怎会知道,在当时的中国,表演者常有成为木偶的危险。假如你对剧场和观众所知甚少,你就不得面临一个被歪曲和篡改的自己。泰戈尔此行的遗憾正缘于此,当他被当作诗圣和神一样崇拜时,他出于诗人的浪漫所做出的热情回应,在左翼知识分子眼里,自然像是不切实际的“天方夜谭”了。

西谚有云: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孙宜学的这本书大概也是希望做一种正本清源的工作,将一度被中国知识界的“文化寻租”扭曲了的泰戈尔归还给他自己吧。至少在我看来,泰戈尔的身影就比以前清晰了很多,合上书本,我仿佛听到了这位深爱着中国的老诗人由希望之巅峰跌落到失望之谷的一声沉重的叹息。